

Mega Systematic Theory of Value

王志华 著

大系统 价值学说

——
变革的政治经济学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Mega Systematic Theory of Value

大系统价值学说

—— 变革的政治经济学

王志华 著



SAN 95/04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系统价值学说: 变革的政治经济学/王志华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4.3

ISBN 7-80677-696-6

I. 大… II. 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理论—理论研究—中国
IV. ①F0-0②F1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656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狮岗)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75 2 插页
字数	323 000 字
版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
印数	1~10 000 册
书号	ISBN 7-80677-696-6 / F·1018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合群一马路 111 号省图批 107 号

电话: [020] 83780718 83790316 邮政编码: 510100

邮购地址: 广州市东湖西路邮局 29 号信箱 邮政编码: 510100

(广东经世图书发行中心)

本社网址: www.sun-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走进理论创新的新时代

——编者的话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一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无时无刻不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日新月异和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在这场巨大的变革中，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实践积累，也在呼唤着我们的理论创新走进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以勇于理论创新而闻名于世。党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光辉典范。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

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走进了社会主义新中国。邓小平同志也是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是邓小平理论带领中国人民走进了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社会繁荣的新时代。“三个代表”思想的确立，不仅表现出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在理论创新上的巨大勇气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而且也是在向全党发出理论创新的新召唤。

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时起，我们党就在实践中召唤着理论创新。当时就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能不能找到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相对应的理论体系。”“三个代表”思想提出前后，江泽民同志的多次讲话都在号召全党要勇于理论创新。他不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

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而且在为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写的《全国干部学习读本序言》中写道：“创新，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创新精神，在学习前人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扬弃旧义，探求新知，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学创新。”“扬弃旧义，探求新知”，就是要根据社会发展前进的具体实际，不断充实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断调整修改经典作家在过去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所作出的论断，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长河注入新的源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灵魂所在，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发展观。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惟其与时俱进，才有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我们说，坚持马

克思主义，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活的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的前进方向，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论断、每一个原理都奉为圭臬而不允许丝毫的改动和创新。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是在不断修正、发展、创新的。惟其如此，才有了十月革命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胜利，才有了中国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并主要依靠农民取得的成功，才有了产生于改革开放实践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固守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同认识与做法，所导致的是完全不同的结局：一个是具有 70 年历史的前苏联解体；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修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而转变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实行市场经济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已经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可以创新发展的，也是必须创新发展的。只有创新发展才能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创新发展

则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才一再发出要理论创新的号召。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伟大胜利的必由之路；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鉴于上述的认识，我们编辑出版了王志华的《大系统价值学说——变革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来，先后在国内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九篇论文，1998年在香港国际政治经济出版社出版《大系统价值学说——政治经济学的变革》，并多次应邀参加学术讨论会和报告会作大会发言。其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论述已在国际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以极富探索精神的理论勇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关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长久生命力，根据对历史的深刻分析，对不同国

家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比较，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正确认识，重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他的主要观点，不仅为许多学者认同，而且已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的。尤其是作者关于智能劳动论，科技利润说以及对价值、资本、剥削的论述，从更深的层次和更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解读了“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人们更新观念、顺应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极具启迪意义。

本书是根据香港版的原著编辑修订的。在编辑的过程中，编者与作者共同研究和协商，已经对香港版原著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调整，这一点已在作者的后记中说明。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创新的理论体系，它一定还会有不足之处，在编辑工作上也还会有缺漏，我们衷心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观点上，本书也可能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会引起一些争论。我们衷心希望有争论。争论将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

的创新和本书的完善。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后，曾引起广泛的争论，产生巨大反响，人们因之动摇了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笃信，从而引发了“凯恩斯革命”，使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与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的三部经济学伟大著作。我们衷心希望，立足于对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总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能引发起一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变革；同时也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必将导致这样一场变革，这个变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片热土上是必定要发生的。

编 者

2004 年 3 月

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①

立足改革发展实践 创新经济科学（原版序）

邹东涛^②

当我读完王志华同志这本书稿时，感到手中写序的笔有些沉重。因为这不是为一本一般的阐释性的经济学书籍写序，而是为一本探险和创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写序。

—

1985年春，我到广州参加了“全国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

① 转引自郭兴华文；《人民日报》1992年12月28日。

② 邹东涛，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者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提交给该会的论文《改革中的理论和理论的改革》及与会发言中，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 理论再也不能跟在实践后面爬行；
- 对“基本理论”也要进行再认识；
- 要破除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
- 创新——改革时代理论家的基本任务；
- 探险——理论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等等。

我深深感到，这本著作较充分地体现了上述特色。更为可贵的是，它充分反映了这位“行伍”出身的业余研究者的理论创新精神和探险精神。

当你读了作者下述观点之后，或许你认为作者是“离经叛道”，从而使你“义愤填膺”；或许你认为作者是“标新立异”，甚至是“异端邪说”；或许你认为作者是“轻浮草率”，治学“极不严谨”。然而，你不得不承认，作者是以一种大无畏的勇气重新改写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其理论体系：

●劳动价值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商品价值的实体不是社会必要劳动的凝结，而是商品功能对于人类生产生活需求所产生的作用；

●资本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而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实实在在的物质生产力；资本无罪，资本生产无罪；

●剩余价值不是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产物，而是科技发展的产物；

●雇佣劳动并不是必然等于剥削，而是资本协作的形式

之一；

●剥削的根源并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的本质是主权剥夺，剥削形成于极端的自由竞争；

●生产力不决定生产关系，传统论点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人类历史上不存在“母系社会”，原始群落的首领是在竞争中由强者决定的；

●“原始共产主义”是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猜想，等等。

以上观点的论述和证明，尽管存在着不充分、不完善的地方，但却为我们对传统理论进行重新认识展示出了种种新的思路，为传统的思维定势的革新打开了一扇扇窗户。

3

二

就本书旗帜鲜明的理论观点来看，确实有点“异端”了。然而，在人类思想理论发展史上，包括经济科学发展史上，“异端”却往往成为科学发展的新契机，当“异端”被人们认识并被实践证实之后，也就成了正统，这种正统又可能被后来的“异端”所打破。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思想理论科学的发展史，就是“异端”的不断推进史。不用说是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例如，“日心说”在历史上就曾是一种“异端”，这种“异端”在取代“正统”的“地心说”中就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其间发生了

“日心说”的宣传者布鲁诺被处火刑的悲壮事件。

改革的时代，是我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大发展的年代。一方面，原有的理论体系与改革的现实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差；另一方面，改革的丰富实践不断呼唤着原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

然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比实践的创新和发展难度要大得多。比如，较早“下海”的人，不仅个人取得了丰厚的收入，而且为社会也创造了巨大财富，成为新体制的开拓者和新时代的弄潮儿；而较早理论上主张并宣传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的人，则大多受到种种责难和批判。较早创办个体、私营经济的人，大多成为大款，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典型人物，还被选拔为各级人大和政协的代表参政议政；而较早理论上主张和宣传在中国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人，却给自己带来了不尽的麻烦，并且大多与清贫为伍。在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对比下，谁还愿意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去努力、去奋斗呢！

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需要理论的科学指导。然而，理论并非处处走在改革的前面，科学地指导改革，而是往往处在被动“应战”的地位，跟在改革的实践后面艰难地“爬行”。“实践中行得通，理论上说不通，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中行不通”的现象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越来越普遍、越严重，形成了“实践步步为营，理论节节败退”的局面。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传统理论“刚性”太强，对于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实践漠然视之，固守书本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这些年来，我国理论界也出版有不少“新学说”、“新理论”、“新探索”之类的书籍，但读过之后，实在不敢恭维有多少“新”意。如果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对旧房子的某种形式的新装修而已，或者说是对其堆积木的新堆砌组合而已。尽管我们也一直在高喊理论研究要创新、要发展，但实际上，则处于一种“创而不新，发而不展”的状况。当然，这绝不是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不愿意和没有能力去创新、去发展；我们的出版工作又何尝不想多出版具有创新和发展意义的理论著作呢！问题在于，我们未能给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

多年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两个部分：基本原理与具体理论，或核心理论与外围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似乎只是对具体理论和外围理论而言，而基本原理和核心理论则是永远不能触动的禁区。凡是禁区，同时也就是险区和“雷区”。有多少人愿意或者能够去探险和“触雷”呢？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既应包括具体理论和外围理论，也应包括基本原理和核心理论，而且后者还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封闭起来，就会使它成为教条主义的“避难所”和“藏身地”。这不仅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更重要的在于，它往往成

为改革的实践不可逾越的屏障。我们在改革实践中常常遇到的理论难题，一般并不在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而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采取僵化的态度。

一个最普通的基本常识是，地图是根据地球表面的客观地理情况绘制的。地理科学的研究发现，地球表面的大陆是一个缓慢漂移的板块结构，到若干万年之后，大陆结构的形状改变了，如果我们还继续使用现在的地图，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当地图不符合地形时，要修改的是地图，而绝不是地形；当理论不符合实践时，应当修改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历来反对把他们的理论看作是“最终规律”，“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恰恰违背了他们的遗训，把基本原理当作不变的、永恒的真理。无论社会实践怎样发展变化，无论改革开放怎样深入进行，似乎基本原理永远是“万古常青”的，永远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一方面，我们反复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另一方面却把基本原理排除在外，不仅不受实践的检验，反而还成了评判实践的“最高法官”。

多年来，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形成了这么一种范式：不是用丰富的实践去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总是习惯于运用基本原理去“阐释”实践。这样，就把社会科学变成了单一的“阐释学”，把社会科学家变成了单一的“阐释家”。当实践的发展客观上已经突破了某些基本原理的屏障时，就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当某个领导出





来说了话以后，于是某个“基本原理”就变成了“个别结论”而不再维护。这差不多成了我们许多理论家的思维定势，即便是某些在改革开放中思想解放的同志，也往往逃不出这种窠臼：一方面对现存的不合理因素极为不满，积极倡导革故鼎新；另一方面，又对形成这种不合理因素的理论根源怀有深厚的“感情”，不容许越雷池半步，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思维和行为的矛盾，以及改革发展的愿望和理论上感情色彩的矛盾。

四

本书的作者，一反我国理论界的这种思维定势和理论研究窠臼，跳出上述内在矛盾性，从新时期的改革实践出发，以探险精神触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雷区”，试图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成熟的”、“稳定的”理论体系，它的理论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它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把“剩余价值理论”与“唯物史观”相并列，作为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显然，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核心内容。过去，我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否定和批判，无不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项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分配制度和国民经济统计核算方法，都